

面向生活世界本身

——綜合性學術期刊內涵發展探賾

葉祝弟

[提 要] 針對學術研究遠離生活世界,理論研究對現實研究“失焦”、“失距”,文風晦澀,辭藻貧乏的狀況,面向生活世界的綜合性學術期刊,嘗試提倡一種介入的、有情的、有想像力的、“有思想的學術與有學術的思想”兼容的學術。綜合性學術期刊可以探索一條以問題意識為中心,針對時代重大命題,主動設置議題和打造標識性概念,同時提倡一種真正的跨學科研究,探索建構針對綜合性學術期刊特點的學術評價體系,重建由不同學術共同體聯合而成的“跨學科學術共同體”的辦刊思路。

[關鍵詞] 綜合性學術期刊 生活世界 跨學科研究 議題設置 學術爭鳴

[中圖分類號] C0; G2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20)01-0110-12

筆者在最近組織的“突破學科藩籬:技術時代中國人文學術的因應之道”的圓桌筆談的主持語中寫道,“種種跡象表明,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正走在激變的前夜。一方面,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和國家的重大戰略向人文社科研究提出了新命題和新挑戰;另一方面,人文社科研究和評價的學科化、數目字化、內卷化問題依然突出,甚至有加劇的趨勢”。^①筆者的這一論述基於日常觀察和理解,雖然不夠全面和準確,但是,不可忽視的是,近年來,無論是人工智能還是基因編輯,無論是精準扶貧還是城市治理,重大社會現實問題的解決呼喚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深度介入。這種介入,意味著人文社會科學需要在兩個相互關聯、同等重要的向度上用力——一是以學科為中心的經年而紮實的專業研究,尤其是那些被稱為“無用之用”的人文學科,因為其涵養心靈和“仰望星空的價值理想追求”^②而愈來愈凸顯其價值和意義,並將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二是直擊時代靶心、具有強烈的問題意識和現實關懷的跨學科研究迫在眉睫。可以佐證的例子是,2018 年底國家科技部等五部門發文開展清理“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專項行動以及新一輪長江學者評選指標的調整凸顯對跨學科研究的倡導,某種程度上正呼應了這一新變,呼喚著中國人文社科研究新的突圍。這其中,以問題為中心的跨學科研究應是重要的突破口。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思考中國綜合性學術期刊的出路問題,^③就會發現這幾年一直不被業界看好的綜合性學術期刊,並非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相反,隨著跨學科研究的蓬勃發展,綜合性學術期

刊因為其跨學科、綜合性的定位和特色，在一個亟需多學科協同攻關、多領域協同創新的新環境下，面臨著發展的新機遇。本文試圖以此為視角，探討綜合性學術期刊內涵發展的新可能。

綜合性學術期刊困境：一個依然待解的難題

長期以來，綜合性學術期刊因為同質化、單一化的問題，尤其是“全、散、小、弱”的弊端，廣受學界詬病。2009年，朱劍教授以入選教育部名刊工程期刊為例撰文指出，名刊學報至少在學報體制、協同合作、數字化傳播和社會評價方面，尚未有突破性的進展。^④十年過去了，在各界的努力下，綜合性學術期刊學術影響力和社會影響力有了一定提高，但是，整體而言，朱劍所陳述的問題依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一邊是專業刊佔據了最好的學術資源，學術影響力蒸蒸日上，一邊是綜合性學術期刊的向隅而泣，歧路彷徨^⑤——綜合性學術期刊在體制性的惰性中彳亍而行，期刊編輯則一直深陷首尾難以兩顧的身份焦慮中。2012年原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出台的《關於報刊編輯部體制改革的實施辦法》雖然無疾而終，但其更像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始終懸在綜合性學術期刊辦刊人的頭上。這些都表明，辦好綜合性學術期刊依然是一個待解的難題。

筆者以為，綜合性學術期刊要走出困境，首先要在中國語境下，弄清楚綜合性學術期刊的癥結所在。而要弄清楚學術期刊的中國問題，則要弄清楚，學術研究的中國問題出在何處。因為綜合性學術期刊的改革，不僅是中國學術期刊體制的一部分，而且深深嵌入在中國社會發展進程中。綜合性學術期刊既存在自身的問題，更有外部環境的變化所帶來的問題。一方面，人文社科學術生態制約了綜合性學術期刊的發展；另一方面，對於今天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生態，綜合性人文社科學術期刊亦承擔不可推卸的責任，兩者是彼此成就，彼此制約的關係。因此，考慮綜合性學術期刊的問題和出路，還需要將其放在社會大環境中來審視。在筆者看來，綜合性學術期刊的中國問題，根本在於綜合性學術期刊的意義危機，即學術期刊所生產出來的知識，到底是滿足論文發表—知識循環，滿足於各種學術期刊排行榜的名次，還是適應社會現實的需要？如果跳出狹隘的學術圈，我們可以看到今天的學術生產的危機，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有效知識供給不足的危機^⑥、思想和學術斷裂的危機以及由此導致的學術生產的意義危機。值得警惕的是，今天，懸浮型學術^⑦造就了懸浮型學術期刊——上無法深入推進艱深學問的積累，下無法回應社會現實的需求，這大概是綜合性學術期刊的現狀。當然，這並不是說，當下中國學術的危機跟專業期刊沒有關係，關於中國知識生產危機與專業期刊關聯的觀察和思考，限於篇幅，筆者將另外撰文討論，本文主要還是在文獻梳理的基礎上，就綜合性學術期刊的內涵發展談談自己的一孔之見。

對於綜合性學術期刊問題和出路的思考，高校學報的當家人身在高校，感同身受，對綜合性學術期刊困境的檢討和反思更加自覺和迫切。仲偉民教授將之概括為“專業化、集團化和數字化”^⑧三種思路，相對而言，專業化和數字化討論較為集中，認同亦較多。對於專業化思路，痛感高校“大拼盤式的綜合性辦刊模式”的弊端，仲偉民提出專業化為根本，“在專業化的基礎上，同時實現學報的集團化和數字化轉型，是最為理想的進路”，^⑨劉京希具體提出了大專業或小綜合模式、專業性模式和專題性模式等三類專業化轉型的可欲方案。對於數字化思路，以《澳門理工學報》“總編視角”所刊載文章為例，2011~2014年所刊發的文章中僅有徐楓、朱劍等少數幾位學者涉及這一話題，而到了2015~2017年，圍繞在線優先出版、域出版、互聯網思維、互聯網+、媒介融合等話題，綜合性學術期刊的主編們紛紛建言獻策，“熱情洋溢地暢想大數據時代學術期刊的生存與發展”。^⑩

有一種觀點認為，綜合性學術期刊應調整為專業性學術期刊。學科大拼盤的思路固然不對，在

專業分工越來越精細化，學科越來越內卷化的今天，特別是現有的管理體制沒有做出根本改革的情況下，綜合性學術期刊改版為專業刊的思路是否具備現實的可能？且不說，高校學報改為專業刊，首先要面臨來自學校各個層面的壓力，即便改為專業刊，要想在日趨飽和、競爭激烈的專業刊群中分一杯羹，其付出的艱辛可想而知。這幾年不乏一些高校學報改為專業刊後，又退回綜合刊的無奈之舉。對此，劉曙光認為，“學報都辦成專業性刊物，同樣會遭遇‘貶值’”，“專業性並不意味著高水平，綜合性也並不意味著低水平，關鍵是論文的學術質量”。^①

這幾年綜合性學術期刊走數字化之路的思路，越來越受到人們的認同。適應互聯網時代學術生產方式的新特徵和新要求，深度推進學術大眾化、時代化，充分利用好數據庫、微信、微博等新學術傳播工具，提升學術和思想的傳播力，努力實現學術話語方式、傳播方式的彎道超車，固然是一條可行的大道，但是，如果沒有這方面的核心編輯人才，這條大道也註定不會平坦。比如互聯網+是近幾年學術期刊界談論得比較集中的話題，討論的熱烈並不代表行動的迅捷，到目前為止，借助於互聯網，雖然如依託於中國知網的“中國高校系列專業期刊”、依託於超星的“域出版”，綜合性學術期刊在多元化探索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績，然而還沒有一家綜合性學術期刊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互聯網+出版。遠的不說，這幾年很多刊物雖然也運營了微信公眾號，然而絕大多數公眾號基本上還停留在每月一期目錄的推送層面，離真正意義上的互聯網傳播相差甚遠。^②在現有的體制下，各自為政的綜合性學術期刊既無法聯合成一個強大的新媒體傳播集團，也無力與知網這樣的大鱷對抗，學術期刊的數字化轉型將是一條漫長的道路。

仲偉民在上述文章中還提及，其實早在名刊工程設想之初，時任教育部副部長的袁貴仁就曾經提出了高校學報改革的三個可行性方案，即所謂的“上、中、下三策”：上策是辦高校學報專業期刊；中策是鼓勵若干高校社科學報合作，組成聯合編委會，進行相對集中的學科專業分工；下策是走內涵發展道路。對此，朱劍認為，上策是根治之法，中策是變通之法，下策只是補救之法。^③縱觀目前的形勢，上策和中策雖然是良策和大道，但是在體制沒有做出根本性變革的情況下，實施起來恐怕尚有一段時間，而作為“補救之法”的“內涵式發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也許還有繼續言說的可能。如果我們放在“國家、市場和社會的三維框架中”^④尋求綜合性學術期刊改革的出路，抑或如《新華文摘》原總編輯張耀銘教授所說的，“一本優秀的社科學術期刊……最重要的是期刊的編者肩負使命、銘記職責，透過內容的價值營造和學術語言的表達，體現出的一種特色、一種傳統、一種境界、一種情懷，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學術創新力、學術公信力和社會影響力”，^⑤那麼綜合性學術期刊的內涵發展依然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話題。我們可能還要思考的是，綜合性學術期刊的綜合性到底意味著什麼，當我們反覆用學術本位、學術規範、學術創新、學術評價、學術傳播、學術共同體來言說綜合性學術期刊時，其實我們還是在學科、學術的專業刊邏輯下討論綜合性學術期刊的出路，學術本位固然重要，但是除了學術性，我們該如何理解綜合性？不解決這個問題，綜合性學術期刊就找不到自己的辦刊方向和辦刊自信。長期以來，在專業刊面前，綜合性學術期刊總覺得自慚形穢，但是我們要反思的是，當脫離綜合性奢談專業性時，我們是否在削足適履中放棄了自己的特色？此外，我們該如何理解綜合性之於綜合性學術期刊的內涵、意義和價值以及綜合性與專業性的張力、邊界在哪裡？

事實上，近年來，在推動期刊發展和引領學術方面，很多優秀的綜合性學術期刊立足特色，發掘內涵，主動出擊，採取了諸如舉辦大型學術會議和專題論壇，依託名家倡立特約組稿人制度，設立優秀論文獎等諸多措施，取得了矚目的成績和不錯的反響。筆者試圖在下文中，從面向生活世界本身

的學術、以問題意識為中心主動設置議題和打造標識性概念、倡導真正的跨學科研究等三個方面，淺談自己對綜合性學術期刊內涵發展的理解，以求教於方家。

面向生活世界本身的綜合性學術期刊

討論學術期刊的內涵式發展，首先要回到綜合性學術期刊的定位和特色。對於人文社科研究來說，也許我們要考慮的一個嚴肅的問題是，學術研究究竟是滿足於發表，還是面對社會真實問題尋求解決方案？如果是前者，學術研究只不過充當了一個為稻粱謀的工具；如果是後者，學術研究應該關注和回應社會提出的真問題。同樣，對於學術期刊，我們要思考的一個嚴肅的問題是，學術期刊僅僅滿足於做一個學術論文發表和交流的平台，還是要承擔價值引導、回應社會關切的使命？當然，這也許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話題，但是，如果我們認為，“對本時代的生活世界問題意識的感應，是學術生命生生不息的根基”，^⑩那麼學術就應該植根生活世界，對生活世界表達一種態度，承擔一份公共責任。作為提供公共產品的學術期刊，自然也要面向生活世界本身，承擔其公共責任。現實生活向學術研究提出了無窮的問題，學術期刊必須面對鮮活的現實生活提出的種種挑戰，致力於為發現和解決生活世界提出的真問題提供學理支撐。

第一，面向生活世界的綜合性學術期刊，當提倡一種介入的學術。如果我們承認學術期刊不僅有學術展示的功能，還有價值引導的功能，那麼我們就應該承認學術期刊不應該秉持價值中立，它要通過話題的選擇和議題的設置，提供一種價值判斷和價值理念。這樣的價值判斷，不僅在於告知什麼是好的學問，還要告訴人們什麼是好的生活以及如何達致這種好的生活。以人文性為價值基點，將重新審視人的存在狀態和意義世界，以及圍繞生活世界所存在的真問題進行討論。面向生活世界的學術期刊，不僅要為解決和解釋現實重大問題提供方案，而且要為什麼是好的生活，如何達致美好生活提供思想資源，“通過思想的力量和觀念的革新，促進整個社會向著文明、多元、包容、開放的方向發展”。^⑪以費孝通先生為例，他的一生就很好闡釋了面向生活世界本身的學術意義和價值。他把自己對鄉土中國的研究，當成是一種情感和責任，“我的選擇是出於一種價值判斷”，這個價值判斷用費老的話就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和“學以致用”。土生土長的學者怎麼研究本土社會，如何保證研究的有效性，費孝通提出進得去，出得來的辦法。沒有本土化、中國化的問題意識，沒有學術反思和文化自覺，沒有“認識中國，改造中國”的價值觀的指引，費孝通先生也就不可能提出“差序格局”、“文化自覺”這些具有原創意義的命題。^⑫

第二，面向生活世界的綜合性學術期刊，應提倡一種有情的學術。所謂有情的學術，即一種具有人文情懷的學術心智和學術質量的學術。學術文章固然是要講理，但是講理不是學究氣，更不是了無生氣。有情的學術，是對當下充斥著冰冷的文字、無聊的概念抑或空洞的說教的遊戲學術的遠離，它是在情理交融的學術中浸染生活的氣息和生命的活力，是學者個體的生命體驗與社會整體命運的緊密結合，是學者在與現實世界的偶遇、凝視、交談、較量甚至搏鬥之後的心靈痕跡，最終所呈現的是學者與這個世界的血肉聯繫。倡導有情的學術，即倡導學者將對時代和世界的思考融入到切己的生命體驗中，對時代問題葆有切膚之痛，並將這種切膚之痛的生命體驗轉化為自己研究領域的命題。有情的學術，一定是“作為精神上的志業”，而不是櫥窗裡把玩的展品或者屏風上的風景。^⑬

第三，面向生活世界的綜合性學術期刊，應提倡一種有想像力的學術。今天的學術論文普遍文風晦澀，辭藻貧乏，味同嚼蠟，而當下風行的量化研究，則將問題消失在大量似是而非的數據中，其

結果是理論研究對現實研究的“失焦”、“失距”。^①這一切背後正是學術想像力和思想力的缺失。日常生活紛繁複雜，研究者如何不至於墜入庸常的日常而迷失方向？米爾斯在《社會學的想像力》中提出，應該培養一種可以洞察這個社會本質並找到某種滿意的解釋和啟發的想像力。米爾斯針對的不只是社會學，更是整个人文社會科學。米爾斯的“社會學的想像力”理論提出後，引起了中國學術界的共鳴，關於重建社會學的想像力、政治學的想像力和法學的想像力之類的呼聲不絕於耳。學術界遠離想像力久矣！當理性的囚籠禁錮了人們的頭腦，學術淹沒在冰冷的數據、瑣碎的論證和無聊的細節中茫然不知所措，當學術忽視了“高遠的學術理想、追求真理的熱忱、探究過程中的痛苦和快樂”^②時，學術想像力的天空難免不會坍塌。

學術研究如何獲得想像力？米爾斯提出了歷史的和社會結構的視角，吉登斯提出了發展的、全球的、比較的、聯繫的視角，這些都不無啟示，然而學術想像力的獲得，也許不是尋求一套方法和理論的靈丹妙藥，而是閒暇之餘的神思，是靈光一現的天啟。海德格爾在《演講與論文集》中提到“疏異”——“在種種熟悉的現象中，詩人召喚那種疏異的東西”，在天空的光輝照耀下，被遮蔽和疏異的神明將被顯現；什克洛夫斯基所謂的陌生化，從熟悉的世界抽身而出，自覺與研究對象保持適當的距離，進而獲得一種超越的力量。不過，學術研究想像力的獲得，最終要落實到魯迅所主張的“人各有己，不隨風波”（《破惡聲論》），“剛健不撓，抱誠守真”（《摩羅詩力說》），掙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立具有白心（直率的人生態度）、神思（富有現象力）和誠與愛的現代人。

第四，面向生活世界的綜合性學術期刊，當致力於建構一種“有思想的學術與有學術的思想”兼容的學術。張耀銘對學術界的平庸現象有過一針見血的批評，“學術平庸的主要表現形式是低水平重複、膚淺分析和把學術變成‘娛樂至死’的舞台，其本質特徵是思想能力的缺失，美國政治理論家阿倫特稱之為‘平庸之惡’”。^③對於學術論文思想能力缺失的問題，學術界已經多有討論和批評，但是如何才能超越平庸，卻眾說紛紜。筆者以為，王元化先生在晚年提出的“有思想的學術與有學術的思想”，可以作為學術期刊編輯在擇稿和辦刊時借鑒的一個標準。

“有思想的學術與有學術的思想”，是王元化先生針對李澤厚先生所提出的“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的感言，而在1994年所寫的《學術集林》卷一編後記中提及的觀點，^④不過他生前並沒有詳細闡釋其中的微言大義。2015年，夏中義教授在回應王元化先生的好友樊克政先生的來信中，就這一命題提供了自己的解讀——“‘有思想的學術’作為終極性關懷，是在宣示元化不屑當書齋蛀蟲，他願‘一心唯讀聖賢書’，然婉拒‘兩耳不聞窗外事’，只有令其讀書聲能深刻、獨特地感應且解析歷史風雨聲者，才是元化心中‘有思想’、有體溫的真學術；與此相對應，‘有學術的思想’作為操作性規程，則在概述元化敬畏‘思想’的有效性將首先有賴於思辨構建的邏輯自圓，這樣才可能經得起歷史與良知的證偽而不自行垮塌”。^⑤夏中義近年基於王元化、錢鍾書、李澤厚等諸學人的學案研究提出一系列新命題，諸如“思想默存於學術”“思想家的社會責任”等即廣為學界矚目。夏中義教授推而言之，與“有思想的學術與有學術的思想”相對應的，則是學術界普遍存在的思想與學術的分離狀態——“無思想的學術”和“欠學術的思想”。思想遠離學術，遊學無根；學術遠離思想，形同槁木。楊國榮教授認為，學術關涉事實層面對世界的認知，而思想則關涉理論層面和價值層面對世界的關切。^⑥作為一種立足於生活世界的學術追求，有思想的學術與有學術的思想，所提出的思想命題應以學術的方式言說，遵循的是嚴格的學術規範和縝密的學術邏輯；而學術命題則應蘊含強烈的問題意識、現實關懷和價值選擇。有思想的學術與有學術的思想，倡導的是學術與思想的互動，實證與思辨的溝通，問道與問學的辯證，是有鋒芒的思想與有厚度的學術的完美結合。

主動設置議題和打造標識性概念並重

學科導向還是問題導向,是專業學術刊物與綜合性學術期刊的一個重要區別。當然,這兩者之間並不是截然區分的,專業學術期刊也要以問題為導向,綜合性學術期刊也應以學科為根基。主動策劃選題和議題設置是綜合性學術期刊質量的重要保證,好的議題可以吸引優秀的學者,迅速形成核心作者群,提高刊物的影響力。議題設置強調差異性和不可替代性,但歸根結底,議題設置應以問題導向為中心。在當下中國,應倡導一種以問題意識為中心的關涉價值和意義的學術研究。馬克思明確指出:“主要的困難不是答案,而是問題。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問題。”^④學術期刊的問題意識是指學術期刊的編輯直面當下中國現實世界,發現和提出時代的大問題和真問題。紮根於日常生活世界的學術研究,無不是以問題為中心的。從學科導向轉向問題導向,面向現實世界和生活世界本身,意味著綜合性學術期刊及其編輯,要有對現實的敏感和強烈的問題意識,敢於提出問題,創設議題,組織專題討論。

問題意識是“逆向夜行”,^⑤好的問題意識既可能來自於知識譜系的總結與反思,也可能來自於現實生活挑戰和刺激,又可能來自於歷史的深度思考和反思。這包括雙向而行的兩個維度,一是善於從現實中發現問題;二是善於向時代提出問題。綜合性學術期刊所提倡和堅持的問題意識,可以理解為是以學術的方式把握生活世界的現實問題。只有在不斷向時代發問中,才能培育獨特的問題意識,而只有具備反思意識和批判精神以及深厚的學術根基,才能具備不斷向時代發問、並將時代問題轉換為學術問題的能力和動力。好的問題意識應該關注時代重大命題。什麼是時代的重大命題?有學者指出,今天的命題就是,在權力、資本和技術的三重視野下,如何克服價值虛無的危機,重建人的主體性問題,即人如何安頓身心的問題。這方面,俞吾金教授可謂表率。俞吾金教授是一位極具問題意識、反思意識和批判精神的學者,他在生前曾經撰文指出,“所謂問題意識,就是人對自己周圍的各種現象,尤其是在自己研究的領域裡,不採取輕信的態度,而總是自覺地抱著一種懷疑的、思索的、弄清楚問題的積極態度”。^⑥以俞吾金教授發表在《探索與爭鳴》上的18篇文章為例,其中直接以反思命名的論文達5篇之多,其他也大都表現出極強的問題意識和批判精神。像《批判理論的界限——對法蘭克福學派主導思想的反思》、《左翼理論家們的阿基里斯之踵——以對拉克勞思想的剖析為例》來自於學術理論譜系的反思;《對“馬克思熱”的冷思考》、《重思馬克思主義與現實的關係》、《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主體的反思》既是對學術問題的反思,更是對現實問題的觀照;《歷史沒有旁觀者》、《歷史大錯位中的文化價值重建》則將視野投向了歷史中,而《我們該在何種意義上使用文化——對“文化自覺”的元批判》更是針對費孝通先生提出並被廣為接受的“文化自覺”提出了前置性反思,而這正是善於在不疑處存疑的懷疑精神。俞吾金教授的問題意識與現實關懷,和《探索與爭鳴》關注時代重大現實問題定位是契合的,學者與刊物之間形成了彼此成就、相得益彰的良性互動。

在筆者看來,一個問題意識強烈的編輯,必須具有將實踐問題轉化為理論問題,並通過議題設置提出學術命題的能力。好的議題是敏銳地關注和追蹤那些回應時代重大關切,上達學術殿堂,下入生活世界的話題。一個好的學術議題應該具有獨創性、前瞻性、公共性、可持續性和可對話性。像人工智能與未來社會、微時代的精神狀況等一些議題,都是隨著科技飛速發展而產生的新議題。這些話題顯然超過了某一學科和某一領域,本身就是極具前瞻性的話題,但是對於這些話題的深度討論,不僅需要深厚的專業知識人才,更需要不同領域的學者參與。而如何從紛繁複雜的議題中擇

選出真正具有前瞻性和公共性、可持續性和對話性的命題，並將之放置於歷史、現實和跨學科的三重視野下進行學理審視，組織和邀請不同學科的學者進行對話、論辯，這顯然對綜合性學術期刊編輯的學術議題捕捉和設置能力、學術組織和協調能力都提出了挑戰。

議題設置的另外一個途徑，就是打造標識性概念。“思維無內容是空的，直觀無概念是盲的”^⑨，概念是人類知識體系的基本單位，概念的解構和建構是學術創新的基點。^⑩標識性概念是一套新的術語系統和觀念體系，它不僅能給學科發展帶來哥白尼式的革命，而且能為解釋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新的知識系統和認識框架。

當然，打造標識性概念是一項風險極高的探索性工作，因為標識性的概念必須是原創性的、可識別的、具有現實針對性和可闡釋的、經得起檢驗、得到普遍認可的概念。標識性概念紮根於日常生活世界，是學術問題、核心命題、理論創新與社會實踐結合的知行合一的產物。一方面，標識性概念內在地要求學術界必須深植時代實踐，把握時代脈搏，提煉出來的概念才能對現實世界具有可闡釋力和可指導性；另一方面，標誌性概念紮根於深厚的學養，沒有艱深的學術積澱，不可能具有提出真正有價值的概念和命題的能力。

打造標識性概念本質上是提倡和構建一種原創性學術。原創性學術非一夕之功，它是鄧小南教授所說的力度、厚度和難度的完美結合。當然，這並不是說，這項工作就可望不可及，當前，對於綜合性學術期刊來說，可以借助學術本土化籲求的機遇打造標識性概念。學術本土化的主張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注和討論，這既有改革開放的實踐向理論界提出新的解釋框架的需求，也有西方理論神話破滅後知識界的覺醒，更有國家意識形態的推動。^⑪一個超大規模國家的40年的改革開放之路，已經積累了足夠豐富的實踐經驗，在這塊學術研究的富礦上，以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為中心，今天的學術界已經開始自覺對以西方概念為中心的學術研究範式進行反思，一批具有本土解釋力的概念和範式開始提出，並受到學界的關注和討論。當然，這種學術本土化的努力也遭到了一些疑議，但是我們要看到其背後是中國學術界試圖擺脫世界學術生產體系中的學徒狀態，以及力圖進入到世界知識生產體系中心位置的努力。

總之，打造標識性概念是一份艱難的工作，對編輯提出了全方位的能力要求。其一，議題設置能力水平的大小，考驗著學術期刊編輯的問題敏感、獨到眼光和學術判斷。學術期刊的編輯必須具備敏銳的學術洞察力，諳熟學術前沿和社會前沿問題的動向，特別要關注那些身居學術前沿要衝的學術共同體的研究動向，並與學術共同體保持緊密的互動。其二，標識性概念的打造對學術期刊編輯的知識結構提出很高的要求，它需要編輯具有開闊的理論視野和豐富的知識結構，並根據實踐的變化，不斷調整知識結構。其三，標識性概念的打造是一個複雜的過程，針對所謂“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窘境，期刊編輯應發揮在學術策劃、組織和傳播方面的優勢。主動設置議題和打造標識性概念是一個極具意義的工作，兩者之間是一個相輔相成的關係，筆者同意王利民教授的觀點，“這一寶貴的雙向互動的辦刊嘗試既有效地引領推動了學術發展，又具有極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⑫

倡導真正的跨學科研究

以物聯網、大數據以及人工智能等技術為驅動力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態勢席捲全球，社會越來越綜合化、複雜化。現實提出的問題永遠是有血有肉的，活潑生動的，渾然一體的，生活世界的邏輯決定了現實問題都是跨學科的，依靠單一學科的力量無法解決複雜的社會現實問

題。現實倒逼著學術生產當作出相應的調整，一種真正的跨學科研究勢在必行。

學科研究本質上是社會分工的產物，學科承擔的是知識的分類組織、規範及深化，相較於學科研究的規範化、體系化，跨學科研究具有集成、共享和合作的特點。今天在體制化的權力介入下，學科與現實的分離已經越來越明顯，學科的傲慢和偏見導致的各學科畫地為牢，小圈子的自娛自樂，已經越來越制約學術的發展。然而，現實生活世界並不以學科運作的邏輯來運行，反而對這種脫離日常生活世界，以學科規劃為中心的學術生產模式產生了極大的不信任。面對四分五裂、畫地為牢的社會科學，面向生活世界本身，倡導一種真正的跨學科的研究方法，成為必然的選擇。而這正是綜合性學術期刊本來可以發揮優勢的地方。可惜的是，在專業本位以及體制慣性下所採取的學科拼盤的思路，沒有將跨學科作為自己的努力方向，其結果便是綜合性社科期刊沒有走出一條真正的跨學科研究之路。專業和綜合兩頭兼顧、兩頭不顧的結果就是學科拼盤，然而這已經遠遠不能適應今天複雜社會現實的需要了。綜合性學術期刊如何回應當代社會科學綜合化的趨勢？孫正聿教授提出超學科思路，孫應教授提出“從學科綜合”向“問題綜合”辦刊模式的轉變，^③都不失為一種開闊的思路。因此，回到綜合性的定位，做實做深跨學科研究的差異化發展之路，當是綜合性學術期刊的立身之本，也是與專業期刊錯位發展的可行之路。

對於何謂跨學科研究，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見解，其中熱普科(Allen F. Repko)的觀點相對簡潔明瞭，他指出，“跨學科研究是一項回答、解決或提出某個問題的過程，該問題涉及面和複雜度都超過了某個單一學科所能處理的範圍，跨學科研究借鑒各學科的視角，整合其見解，旨在形成更加綜合的理解，拓展我們的認知”。^④對於跨學科研究是否可能，雖然不同的學者存在不同的看法，但是從整個社會發展的趨勢看，跨學科已經成為一種必然選擇。按照邁克爾·吉本斯等人在《知識生產的新模式》一書中提出的“知識生產模式2”的概念，綜合性學術期刊所要面對和處理的知識，是一種與專業學科知識相對應的跨學科知識，是非等級化的、異質性的、多變的知識。^⑤不同於學科研究的分析路向，跨學科研究採取的是綜合性視野和整全性思維，採用的是綜合、整合的方法，在不同學科專家的交流、對話、整合中，拿出解決問題的方案。整全性思維是一種超越專業主義的批判性視野，它所關注的現實不是某一具體的事物，而是要從瑣碎而雜蕪的社會現實中，尋找到背後複雜的關聯和超越的力量。

跨學科研究可以分為工具型跨學科研究、合成型跨學科研究和超學科研究。工具型跨學科研究是用其他學科的概念、方法或理論討論一門學科的核心問題，其核心是概念、方法的整合；合成型跨學科研究是嘗試打破常規，在原有學科的基礎上突破學科分類的限制，開創新的學科或產生新的學術生長點，而超學科研究則運用學科間的理論、概念或方法提出總括一切的綜合體。^⑥對於綜合性學術期刊來說，面向生活世界的學術研究和提倡一種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兩者構成相輔相成的關係。

第一，抓住跨學科研究崛起的好機會，組織、推動跨學科研究。近年來，得益於技術進步，新興學科迅速崛起，學科邊界日益模糊。比如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領域的交叉和滲透已經逐漸成為新趨勢。對此，綜合性學術期刊大有作為。近年來興起的人工智能熱，對法律、社會和倫理等都提出了全新的挑戰，吸引了法學、社會學、倫理學等不同學科領域專家的興趣，圍繞人工智能與未來社會，不同領域的學者通過召開論壇，發表文章，參與對策研究，如今人工智能已經寫入國家規劃，並已納入學科建設。其他如數字人文則是人文學科和數字技術結合的產物，情感地理則是人文學與地理學交叉結合的產物等。

第二,借助不同學科的力量,尋找綜合性問題的專業解決之道。現實問題都是綜合性的,綜合性學術期刊可以依託各個大學成立的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各個協同創新中心和重大課題專案組的力量,進行深度合作。在選題策劃上,問題化、專題化、集束化是可行的策劃路徑。編輯部在廣泛徵求意見的基礎上設置議題,邀請各個領域的專家針對某一綜合性和複雜性的現實問題,在各自學科視角下充分表達見解,不同學科學者交流觀點,尋找共識,並使有關的知識在以問題為指向的新框架內實現整合,進而最終獲得對該問題的新認識。

以《探索與爭鳴》“圓桌會議”為例,近年來,該欄目每期精心策劃一個當前最值得關注的重大社會、政治、文化話題,邀請6~8位來自不同領域的知名專家,召開小型座談會,專家從不同學科、不同視域進行探討和頭腦風暴,最終形成每篇5000字左右的筆談文章。這種專題討論既保證了觀點的多元性,也保證話題的集束效應。以《探索與爭鳴》2018年所策劃的“圓桌會議”欄目為例,這一年該欄目推出了12組話題,產生較大影響力的話題如“逆全球化與新全球化——當今世界走勢與中國發展”(2018年第2期)、“佛系:中國社會心態新動向”(2018年第4期)、“裸之殤:智慧生活中的自主性與秩序性——聚焦Facebook數據洩露事件”(2018年第5期)、“40年改革的中國之道——方法論的視角”(2018年第9期)和“新生命哲學:新興科技與開放的倫理建構”(2018年第12期)等。我們可以看到,這些話題涵蓋了當今中國發生的一些重要現象和事件,而且無一不是綜合性、公共性的大問題,而通過邀請不同學科領域、不同知識背景甚至不同立場的專家對這些事件進行討論和爭鳴,則提供了學術界對這些公共問題的最新思考成果。比如數據時代的隱私、佛系心態、新生命哲學討論的是當今時代的精神狀況問題,關注的是轉型中國的意義危機,探討複雜現代性語境下,技術與文明、社會與個體的互動的困境以及解決之道;逆全球化和新全球化則是討論英國脫歐和特朗普上台之後,全球政治格局的新變化以及中國的應對之道。

第三,借助跨學科的力量,尋找專業問題的超專業解決之道。納米技術、基因工程、人工智能等新興科技迅猛發展引起了科技界與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和討論,新興科技為人類的幸福生活提供了可能,但是也將人類帶向了不可控的未來,它既是懸在人類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也是擺在人類面前的潘朵拉魔盒,正是因為它關乎人類主體的整全、人的尊嚴和人在自然界的地位,由此引發學界對生命倫理與法律、生命價值與全人類命運的深度思考和爭論實屬必然。表面上看,納米技術、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都是非常專業的問題,外行無從置喙,然而,這並不妨礙不同領域的專家對其進行超專業的公開運用理性的意義評估。^⑤因為在科學世界之外還有一個生活世界和意義世界,技術的進步應基於對人類文明的推進,科學研究要遵循“造福於人類”的宗旨,尊重生命的尊嚴,其科研成果不能傷害人類自身。當科學技術或發明僭越了人類文明的底線,傷害了人類的尊嚴和權利,其他學科的專家就有權聯合起來對其進行超專業的評估。科技的發展改變了人類世界,“對科學技術及其專業運用的人文人道價值規範的重要性也空前上升”,^⑥人文知識分子大有用武之地。可以看到,近年來,隨著人工智能熱的上升,人文學科研究反向投入到自然科學研究中,越來越多的人文知識分子用自己的方式介入到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研究中去。可喜的是,國家有關部門已經認識到這種跨學科融合的新趨勢,並在學科建設上推出了一些因勢利導的方案。如教育部高教司吳岩司長在2018年教育部產學合作協同育人項目對接會上所言,我國要全面推進“新工科、新醫科、新農科、新文科”等建設。“新文科是相對於傳統文科而言的,是以全球新科技革命、新經濟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為背景,突破傳統文科的思維模式,以繼承與創新、交叉與融合、協同與共享為主要途徑,促進多學科交叉與深度融合,推動傳統文科的更新升級,從學科導向轉向以需求

為導向,從專業分割轉向交叉融合,從適應服務轉向支撐引領。”^③顯然,在新文科的建設中,綜合性學術期刊大有可為。

第四,推動跨學科學術共同體的建設。^④綜合性學術期刊應該嘗試和致力於建構一個不同學術共同體聯合起來的跨學科的“想像的學術共同體”。綜合性學術期刊固然要依靠學術共同體,但是它所要依靠的到底是基於學科的學術共同體,還是超專業的學術共同體,這可能是一個需要辨析的問題。綜合性學術期刊往往涉及多個學科,這就決定了它很難依靠某一個具體的學術共同體,這也是基於學科評價的各種各樣的學術評價中,綜合性學術期刊一直處於尷尬地位的原因。我們應該看到既有的基於學科而形成的學術共同體的局限,傳統的基於學科專業劃分的共同體,已經無法適應直接面向生活世界的綜合性學術期刊的知識生產的需要,也很難恰當評價綜合性學術期刊所生產出來的學術成果。人們對綜合性學術期刊多有詬難,其中一個說法就是“不夠專業”,這個“專業”其實是針對學科來說的,如果用介入生活世界的有效性作為標準,很難說專業期刊和綜合性學術期刊,哪個更專業。用專業期刊的標準要求綜合性學術期刊,其結果便是削足適履。因此,嘗試建構一套基於綜合性學術期刊學術生產特點的新評價標準尤為重要。而建立這樣一套評價標準,重要的是建構一個能夠評價綜合性學術期刊學術成果的、適合綜合性學術期刊辦刊特點的學術共同體。

有別於專業學術共同體的跨學科專業性和自律性的特徵,以及其主要解決的是專業內部的規範問題,綜合性學術期刊所要依賴和建構的跨學科學術共同體,更類似一個為了解決現實問題而自發形成的超專業的超級共同體,一個“想像的學術共同體”。這個“想像的學術共同體”的成員,由不同領域的具有深厚專業素養的專家組成。與學術共同體的相對穩定不同,跨專業的學術共同體,更像是一個臨時組成的鬆散的共同體,維持這個共同體的是共同的價值、理念、情懷、學術志趣,其特徵主要不是專業和自律,恰恰是自發性和開放性,倡導公共性和自由交往,建立規則,尋找共識,倡導自由的學術交流、合作和對話。跨學科的學術共同體,是在專業領域之外,懷著對生活世界重大話題的關懷的使命感,針對的是生活世界所提出的、超越專業能力範圍內的重大公共性問題進行商討,“通過一種平等主體之間的協商民主形成普遍意義上的重疊共識,為現代社會提供一種基本的行為規範與價值尺度”,^⑤並在一個專業與超專業之間的公共價值與學術價值的雙重維度下,對綜合性學術期刊的學術產品進行評判,它“不僅是知識共同體,也是一個知識人追求真理,尊重學術規範的價值共同體,代際傳承的情感共同體”。^⑥如果這一跨學科學術共同體運作良好,建構一套真正適合跨學科研究特點和內涵的系統、公正、科學的跨學科研究成果評價體系,未來可期。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提出的“面向生活世界本身的學術”,只是探討綜合性學術期刊未來若干發展方案之一種的可能性,而且提倡積極的、入世的學術,並不排斥出世的、“無用的”學術,對於一個良好的學術生態來說,積極的、入世的學術和出世的、“無用”的學術,兩者同樣重要,不可偏廢。此外,學科研究和跨學科研究之間不是替代的關係,而是互補互參的關係。跨學科研究不排斥學科,相反跨學科研究必須以紮實的學科研究和學科訓練為根基,只有學科的成熟,跨學科研究才有可能。離開了紮實的學科研究,跨學科研究只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跨學科研究目的是對複雜的現實問題尋求“基礎性理解”或者問題的解決之道,這一過程必須借鑒不同學科的理論和方法。

總之,立足於日常生活世界的綜合性期刊,在方法論上,可以嘗試提倡一種介入的、有情的、具有想像力的、兼具“有學術的思想與有思想的學術”,以問題意識為中心,針對時代重大命題,主動

設置議題和打造標識性概念,同時提倡一種真正的跨學科研究,探索針對綜合性學術期刊學術生產特點的學術評價體系,構建學術共同體、思想共同體和情感共同體三維一體的“跨學科學術共同體”。筆者相信,一個運作良好的跨學科學術共同體,有利於培育寬容,遠離偏見和自負,本質上這也有利於建構一個健康、包容、理性的社會。站在改革開放 40 年的起點上,綜合性學術期刊的辦刊也許可以探索出一條適合自己的道路。

①葉祝弟、張蕾:《〈突破學科藩籬:技術時代中國人文學術的因應之道〉主持人語》,上海:《探索與爭鳴》,2019 年第 4 期。

②楊揚:《學科評估指標誤置下的藝術學科發展難題》,上海:《探索與爭鳴》,2019 年第 4 期。

③本文所論述的綜合性學術期刊,主要是指社科院、社科聯系統主辦的綜合性學術期刊。事實上,綜合性學術期刊是一個比較複雜的系統,既包括各高校主辦的綜合性高校學報,也包括社科院、社科聯系統主辦的綜合性社科期刊,這兩類期刊之間既存在共性的問題,也存在巨大的差異。社科院、社科聯系統主辦的綜合性社科期刊具有一定的開放性和公共性,相對而言,高校主辦的綜合性學報,在其設計之初,主要是為了滿足本校教師發表論文的需要,儘管後來的高校學報主事者在建構學報公共性方面做了諸多努力,但是這種來自體制的差異根本上制約了高校學報的轉型發展。雖然兩者之間存在較大的差異,但是在筆者看來,在“全、散、小、弱”方面,特別是在來自現實世界的挑戰以及如何立足綜合、打造特色方面,這兩類期刊存在相似的問題和困境,可以互為鏡像和借鑒,因此,本文在論述綜合性學術期刊問題的時候,雖然是立足學報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但這些問題對於社科院、社科聯主辦的學術刊物同樣存在。

④朱劍:《高校學報的專業化轉型與集約化、數字化發展——以教育部名刊工程為中心》,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10 年第 5 期。朱劍撰文認為,名刊學報存在四大有待突破的瓶頸。一是從“全”到“專”的瓶頸:觀念僵化和體制困厄;二是從“散”到“特”的瓶頸:認知錯位與門戶之見;三是從“小”到“大”的瓶頸:載體之惑與傳播障礙;四是從“弱”到“強”的瓶頸:期刊評價與社會認同。

⑤朱劍用“歧路彷徨”來描述核心期刊、CSSCI 的困

境,這樣的表述挪用來描述當下綜合性學術期刊的窘境,筆者認為也是合適的。見朱劍:《歧路彷徨:核心期刊、CSSCI 的困境與進路——“三大核心”研製者觀點述評》,見朱劍:《霧裡看花:誰的期刊、誰的評價》,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 年,第 92 頁。

⑥有效知識供給不足,是中國問題專家鄭永年教授的一個觀點。他認為,與中國的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相比,無論是理論界還是政策研究界,所提供的理論都沒有能力解釋中國經驗。他將之稱為有效知識供給不足的危機,並斷言中國早已經進入知識短缺時代。他認為,中國經濟知識的短缺局面已久,並且對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極其負面的影響,知識短缺的情況不改變,中國的改革就很難從頂層設計轉化為有效的實踐,或者在轉化過程中錯誤百出。鄭永年的觀點提出後,引起學界的普遍關注和討論。參見鄭永年:《中國的知識短缺時代》,新加坡:《聯合早報》,2016 年 1 月 26 日。

⑦“懸浮型”學術是南京大學成伯清教授在《探索與爭鳴》編輯部與華東師範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共同組織的“人文社科研究如何突破學科藩籬,切中現實問題”圓桌論壇上提出的一個觀點。

⑧⑨仲偉民:《中國高校學報的歷史、現狀和將來》,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1 年第 4 期。

⑩⑫許麗梅:《“微期刊”的催生與策略——兼論人文社科類學術期刊的數據化》,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6 年第 2 期。

⑬劉曙光:《高校社科學報功能定位的反思》,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1 年第 4 期。

⑭轉引自仲偉民:《中國高校學報的歷史、現狀和將來》,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1 年第 4 期。

⑮王浩斌:《國家、市場與社會:學術期刊變革中的三維結構》,江蘇徐州:《中國礦業大學學報》,2016 年第 2 期。

⑮張耀銘：《學術期刊肩負的使命和職責》，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2年第3期。

⑯尤西林：《學術生命根基於時代感應》，西安：《人文雜誌》，2017年第11期。

⑰⑱葉祝弟：《介入：綜合性學術期刊改制後的發展之道》，太原：《編輯之友》，2013年第3期。

⑲關於費孝通先生有關“本土化問題意識”與“文化自覺”的詳細論述，參見李建新：《本土化問題意識與文化自覺——從費孝通江村調查談起》，北京：《社會學評論》，2018年第1期。

⑳顧培東：《法學研究中問題意識的問題化思考》，上海：《探索與爭鳴》，2017年第4期。

㉑郁振華：《人文學術如何迎接技術時代》，上海：《探索與爭鳴》，2019年第4期。

㉒張耀銘：《學術期刊要超越平庸》，湖南岳陽：《雲夢學刊》，2015年第4期。

㉓王元化：《〈學術集林〉卷一編後記》，《王元化集》（卷十），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382頁。

㉔夏中義：《王元化學案中的“學術與思想”——回應樊克政先生》，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15年第3期。

㉕參見楊國榮：《學術與思想之辨》，上海：《探索與爭鳴》，2017年第12期。

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3頁。

㉗張志揚：《問題意識：逆向夜行》，海口：《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1期。

㉘俞吾金：《問題意識：創新的內在動力》，杭州：《浙江日報》，2007年6月20日。

㉙康德：《純粹理性批判》，鄧曉芒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2頁。

㉚參見徐勇：《學術創新的基點：概念的解構與建構》，濟南：《文史哲》，2019年第1期。

㉛參見郭震旦：《音調難定的本土化——近年來若干相關問題述評》，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19年第

1期。

㉜王利民：《提煉“標識性概念”設置“創新性議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年12月27日。

㉝孫麾：《從學科綜合轉向問題綜合》，北京：《光明日報》，2004年1月8日。

㉞轉引自唐磊：《理解跨學科研究：從概念到進路》，北京：《國外社會科學》，2011年第5期。

㉟參見邁克爾·吉本斯等：《知識生產的新模式：當代社會科學與研究的動力學》，陳洪捷、沈文欽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3頁。

㊱這方面的詳細論述，參見鄭瑞萍：《中國人文社會科學跨學科研究成果評價探析》，重慶：《重慶大學學報》，2013年第5期；劉小寶、劉仲林：《跨學科研究前沿理論動態：學術背景和理論焦點》，杭州：《浙江大學學報》，2012年第6期。

㊲⑳尤西林：《“知識分子”：專業與超專業矛盾及其改善之道》，上海：《探索與爭鳴》，2019年第1期。

㊳筆者曾撰文提出這一論題，但並未加以論述。參見葉祝弟：《綜合性學術期刊評價困境蠡測——綜合性學術期刊評價體系建構略論》，合肥：《學術界》，2019年第8期。

㊴王銘玉、張濤：《高校“新文科”建設：概念與行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報》，2019年3月21日。

㊵韓璞庚：《公共理性與中國學術期刊的歷史使命》，南昌：《江西社會科學》，2010年第12期。

㊶金志軍、唐忠毛：《學術共同體的構建與學術權力的平衡——“哲社綜合性學報建設的困境與機遇”主編高峰論壇述評》，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學報》，2014年第6期。

作者簡介：葉祝弟，《探索與爭鳴》雜誌主編、副編審。上海 200020

[責任編輯 劉澤生]